

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变革及其转向

王 光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变迁是一个被持续地纳入现代性的知识系统之中和不断做出回应的过程。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它大致展现出三种变迁模式。思想家在探索过程里,其理论倾向逐渐发生改变,并最终完成了从关注“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转向对个体问题的关切;从注重政治现实转入关注政治知识的理论转变。

关键词: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自由;权利;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5-0133-04

作者简介:王光(1983—),吉林吉林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政治思想史研究。

从19世纪后半叶到新文化运动,每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都针对当时当下的某种问题进行思索。同时,近代政治思想的整个变迁历程有它的内在规律,即它持续不断地被纳入现代性的政治知识与价值系统之中,政治思想家们对现代公共生活的认识水平也随之不断加深,并且在理论倾向方面发生了深刻的转向。如果试图讨论这一现象,则需要走进思想家们的精神世界,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观照中或许能够窥见某些端倪。因为,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思想家们的智力水准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一、近代政治思想变革的三种模式

有学者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变革的主要方式总结为三种:出于保障既得利益需要的权势型变革、致力于寻求解放的救亡—革命型变革以及旨在启迪民智的知识型变革^[1]。当然,这样三种变革方式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单向度继承关系,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它们都曾占据过主流。因此,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将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几十年间政治思

想的发展做简要概括。

1. 权势型变革阶段。鸦片战争客观地将中国拖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林则徐、魏源等人反思中国问题的开端。他们把了解西方同如何与之对抗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群体的重大进步。然而,仅仅如此却很难将其划入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序列。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沿着“师夷”“制夷”的思路,以自强为口号,掀起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他们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期达到抵御外辱的目的。曾国藩倡导“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学习运用和制造船炮为实现自强的手段。更为可贵的是,他还特别重视培养西学人才。在曾国藩的努力下,中国第一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开启了近代留学的历史。与乃师相比,李鸿章更加透彻地看到清王朝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强大的外患,他讲:“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覬覦;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2]同时,李鸿章在初步了解西方国家大致情况之后,指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

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3]由是，中国必须求变，而其变重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随着他认识的深入，发现国家富强首先依靠经济实力，求富便进入洋务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中。正如他所言：“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4]至此，寻求富强成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求强求富。洋务派的基本观点是从中西之间在军事、经济实力层面进行反思，进而确定努力方向。虽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他们并未找到中国真正的问题所在——严格地讲，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层面去理解才有意义——然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正产生于这个阶段，其后的各种变革也自这时起。

2. 救亡—革命型变革阶段。洋务运动绝不仅为近代中国贡献了枪炮轮船、矿厂铁路以及一大批专业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求变意识。洋务运动后期，围绕着究竟应以发展经济、科技为主还是应把变革伸向政治领域的问题已经产生某些分歧。如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5]然而，他的批评在当时被看做大逆不道的异端学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决心革新政治，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派思想家借此全面参与变法改革。他们批评洋务派改革没有抓到重点，“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入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6]。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改革应是“变器”“变政”“变事”“变法”的全方位变革。进而，维新派思想家们在洋务派基础之上把眼光放在改革政治制度上，提出“开议院”“兴民权”，在中国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国家。当然，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角度讲，戊戌变法的空想性大于操作性。如果说它的失败是一次顽固势力的反扑，那么，清末预备立宪则重新捡起维新党人的路子，甚至如新官制改革、废科举等问题上较戊戌维新更为彻底。从《钦定宪法大纲》到《十九信条》，从开设咨议局到开放新闻自由，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专制统治。宪法政治、宪政国家等西方近代政治制度与思想进入中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视野，他们把立宪与富强联系在一起，宪政救国成为一种当时乃至其后数十年间极具吸引力的政治口号。然而，与戊戌维新极为相似的

是，清末新政改革依然受到顽固势力的打压。皇族内阁等政治闹剧让人们意识到，扫清专制统治已经非常必要，因此，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数月内，清王朝迅速崩塌，旨在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立宪改革方案彻底失败。

当代美国汉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清王朝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最高领导本来是可以力挽狂澜，扭转政府各方面衰败的。但清廷统治者却没有试图充分利用国家手中的现有资本，给自己发展出强大而有活力的政治机构来获取王朝或全民的目标。他们失去了这种本事。晚晴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是满腹狐疑，犹豫不决，穷于应付，在现代化方面实在谈不上有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作用”^[7]。简单说来，王朝统治的行政能力丧失殆尽无法适应现代化需要，要改变这一局面，则有必要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合法、有效的政权。与君主立宪派相似，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倡导反对专制，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二者本质的区别在于，后者希望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新的共和国家，他们把问题直指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旨在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以及发展民生经济。建设共和国家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辛亥革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破除了君权观念，倡导主权在民的自由平等思想。此外，在政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上，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体制成为首选。宋教仁认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方式能够深刻影响国家的强弱，而“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8]。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起责任内阁，并实行政党政治，国家权力应出自议会，把议会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政治权威是非人格化的宪法，如此，人治的专制统治便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然而，现实的发展并没有走向他们理想的预期，中国社会没能向着他们勾画的理想蓝图迈进。袁世凯打压革命党人，而在他复辟失败病故后，各路政治强人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堂而皇之地介入国家政治，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停滞。

3. 知识型变革阶段。在中国建设西式共和国的理想遭到沉重打击后，人们不得不再度反思，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专制统治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强人统治仍被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改良主义者还是革命党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些在英、美、法、日皆行之有效的政治

体制何以在解决中国问题上毫无效果？一些人开始把目光从关注国家政治建设问题转到思考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的问题上来。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新式知识分子举起科学、民主两面旗帜，掀起一股新文化运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各种思潮并起，因此，很难为它做一种精准的定义，我们姑且仍做一种宏观勾勒，在此基础上做一定程度的剖析。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手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他们提倡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用陈独秀的话讲：“（孔教之）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9]又如胡适言：“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10]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观点带有激烈的反传统情绪，并将“西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林毓生对此评价道，“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其“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特定性质，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的知识倾向”，“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的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的一切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11]。在这样的思想情绪指引下，“全盘西化”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新问题。出于直觉主义的考虑，“西化”大约等同于“现代化”，而现代化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反向立场继续解释。在激进的西化派之外——如果笼统地将陈、胡等人划在其中的话——另一些思想家如章士钊、张东荪、梁漱溟等人则更愿意坚守本土文化，审视所谓的“西化”，他们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思考东西文化和社会问题上，首先对西化观点提出一个预设性的质疑：西化论者们是否非常清楚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如果弄不清这个问题，那么“西化”就没有根基。其次，西化是否意味着全盘抹杀中国旧有文化？第三，即便现代化

是中国未来的出路，那么“西化”（或“欧化”）是否完全等同于现代化？诸如这类问题渐渐为双方的思考和辩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中国近代思想，包括政治思想，无论是出于现实需要还是纯粹的理论思辨，它向着现代性知识和话语不断趋近。中国的问题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军事问题或者政治问题，而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裹挟中通过改造自身而逐渐适应它。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即构建起符合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的政治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是破解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正确选择。

二、变迁背后的两个转向

1. 从关注国家问题转向对个体的关切。与中国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偏好不同，近代西方思想史中的思想先进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首先把视角锁定在对个体问题的关注上来，它往往并不直接涉及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而主要指向了个体理性、自由、权利或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这种从个体到社会的理论思路逐渐成为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主流的西方政治学说的一般逻辑。事实上，一些中国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这点。严复可谓是中国最早解说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的思想家之一，早在甲午年间，他便讲：“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12]随后，他在《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译著中阐述对平等、自繇（自由）等概念的认识。辛亥前后，在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论战中，梁启超率先将视角落实到人的问题上来，他曾讲：“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13]继而，提出了他的“新民”思想。“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4]。在他看来，中国人需要通过“淬厉其所本有”（继承固有文化的精髓）和“采补其所本无”（吸纳西方新思想）培育自由独立的人格。在这一时期里，除了我们通晓的思想家之外，中国的报纸上亦出现大量关注和宣介个人权利的文章。如有人撰文道：“（中国人）数千年固不知民权二字为何物也，骤以民权之说相提倡，其不指为大逆不道者几希，欲竟其说，谁为卒听乎？至于听者无人，其说之不昌也。”^[15]还有人讲，“权利在手则生，不在手则死，到了生死关头，方知道天地间再没有比权利大的了”，“今日非竭力保守权利必不能立于地球之上，非使中

国人人都有保守权利的能力,必不能救中国之危亡”^[16]。他们看到权利对个人和国家的意义,因为“今日之世界,一权利竞争之世界也。故其国民权利思想愈发达,则国愈强,反是者必为人所制,而陷于危亡”^[17]。到新文化运动前后,自由、权利等关乎个体问题的政治概念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赞同西化的知识精英们提出的批评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孔学、倡新学等所有主张无不首先指向个人。在这场“被看成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里^[18],知识启蒙、思想解放、人文关怀等源自西方历史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变成中国的时代标签,个人最终成为思想家们思考和相互辩论的中心议题。

2. 从注重政治现实转入关注政治知识。近代政治思想变迁的背后几乎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景象。在早期大多数时间里,思想家们总是费尽心力地解决现实问题。虽然他们不断地接纳、改造西方政治知识,但从知识发生本身而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显然不具备稳定性。因为,作为一种知识的增量,政治思想的发展动力绝不是只源于现实刺激,知识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带有超验性。思想家们固然总是带着历史的痕迹进行思索,而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永远对着现实说话。也正是因为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问题所在,在承担启迪民智的责任的同时,他们更加注重政治知识的丰富和完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

山等人都有自己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成为后来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到新文化运动时,思想家们围绕着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现代政治话语各自构建着自己的理论系统。西化派思想家们自不待言,即便是所谓保守主义者,对自由、民主等问题也有相当的认识。他们也愿意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中审视中国问题。例如,新儒家的思想重镇,梁漱溟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认识便很符合其固有涵义。“民主”在梁漱溟看来即“凡事大家开会讨论商量,共同取决,是谓民主。其中包涵平等、讲理、尊重多数之三点。民主之民,指多数人而言。民主之主,则有从多数人的主意,以多数人为主体,由多数人来主动,三层意思”,“凡一事牵涉到大家,不是一个人的事,当然大家商量决定。然若于大家无涉的个人私事,大家(团体或国家)亦要干涉他,似亦不合理。于是就有尊重‘个人自由’之一精神”^[19]。民主秩序要依靠宪法和法律落实,人权也需要它做保障。总之,虽然中国没有在一开始便走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固有路径(即从知识到现实),然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已经明显出现了理论倾向的重大转型,即从关注现实转向理论思辨。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家们已经普遍具备现代政治知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在知识层面的不断努力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发生现代化转型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 [1]颜德如.“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J].江苏社会科学,2008(2).
- [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32.
-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 [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4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43.
- [5]郭嵩焘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3:345.
- [6]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38.
- [7]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88—189.
- [8]宋教仁集(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27.
- [9]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660.
- [10]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28.
- [1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6.
- [12]严复.辟韩.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
- [1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44.
-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5.
- [15]清凉散士.论民权之说以驳愈明[N].选报,1902-12-30.
- [16]崇实.说权利[N].云南:第8号.1907-08-25.
- [17]攻法子.英人之权利思想[N].译书汇编,1902-12-10.
- [18]欧阳哲生,刘红中.中国的文艺复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81.
- [19]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六[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25.

[责任编辑 孙景峰]